

“五四”作家 与佛教文化



• 哈迎飞 著



三联文博论丛

SANLIAN WENBO LUNCONG

上海三联书店



“五四”作家 与佛教文化



• 哈迎飞 著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四”作家与佛教文化 / 哈迎飞 著.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2.6

(三联文博论丛)

ISBN 7-5426-1677-3

I. 五… II. 哈… III. 新文学(五四) — 关系 — 佛教

— 宗教文化 — 研究 — 中国 IV. 1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28659号

“五四”作家与佛教文化

著 者/ 哈迎飞

丛书策划/ 苏 梦

责任编辑/ 刘宏伟

装帧设计/ 范峤青

责任校对/ 王有钧

出版发行/ 上海三联书店

(200235) 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http://www.sanlianc.com>

E-mail/sanlianc@online.sh.cn

印 订/ 苏州吴中区文化印刷厂

版 次/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1240 1/32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10

印 数/ 1—3100

ISBN7-5426-1677-3

G·577 定价 20.00 元

总 序

钱谷融

上海三联书店要我为他们即将出版的《三联文博论丛》写序,这一套丛书共有十一本,其中倒有三本是我的学生所写,我当然是义不容辞的。但是说实话,我是很有些惶恐的。记得很多年前,当教育部决定要在大学文科招收博士研究生的时候,有一次碰到北大的王瑶先生,他对我说:“要我指导博士生,但我连博士究竟是圆的还是方的都不知道,叫我怎么指导呢?”现在上海三联的这套丛书内容丰富,涉及的方面极广,有许多是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的,哪有我置喙的余地呢?继而一想,人家不过是找你写篇序,又不是要你写评论,何必这样惶惶然呢?那么,就随便谈点个人的希望和想法吧!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涌现了不少新人,他们大都是从大学刚毕业的研究生,有博士,也有硕士。他们年轻,充满了朝气,常能作出一些想前人所不敢想、发前人所未曾发的建树,学术的前进和发展,主要就

1982.10/11

寄托在他们身上。但是学术研究,毕竟不同于堆柴垛,后来者不一定就能居上,一切有赖于自己的孜孜不倦、锲而不舍的努力。只有钻研得深了,才能把握对象的本真,才能有新的创获。想来年轻的朋友们,总该不会因自恃来日方长而因循怠惰下去吧!

其次,学术上的某种创见,在它初出现的时候,不一定就很完善,它往往只是露了一点苗头,还有待于大家的扶植与灌溉。学术是天下的公器,爱护它、帮助它顺利地成长是每一个学术工作者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倡议者尤其不应就此撒手不管。

再有就是前些年也不断见有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被出版,但都是零星的、个别的,这次这套《三联文博论丛》却较为集中地展示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文学博士们的新成果。他们的成就和水平,他们的优点以及他们的欠缺,一一都展露在人们的眼前,可供今后改进研究生教育工作的参考。当然,这是有赖于各方面读者的不吝赐教的;我们热切地期待着。

二〇〇二年六月五日

序

儒释道思想对中国文学（特别是古代文学）的巨大影响，是众所周知的史实。作为传统中国真正具有对现实世界超越性质的宗教文化，佛教文化虽然自清末以来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但它非但没有像儒家文化那样逐渐走向崩溃，反而扩大了自己在新知识界的影响，从龚自珍到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等都十分重视佛教文化并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一直绵延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知识界。但是，由于政治与文化历史的原因，长期以来现代文学与佛教文化的关系一直是一个少人问津，近乎空白的研究领域。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这一状况虽有所改变，但由于佛学本身博大精深，以及现代作家与佛教关系的复杂性，因此研究尚待进一步深入。迎飞 1996 年进入南大攻读博士学位，她敦厚朴实，专心致志于群书之中，不露锋芒。然而她悟性很高，勤奋坚韧，聪慧其中。她以主要精力从事中国现代文学与佛教文化关系的研究，其博士论文首次将研究重点锁定在新文学的诞生期即“五四”时期，从广泛收集、梳理、分析第一手资料入手，就佛教对诸如鲁迅、周作人、郭沫若、瞿秋白、郁达夫等一大批“五四”作家的影响及

其深层原因，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梳理、剖析与综合研究，资料丰赡，论证细致，颇多创见。答辩委员会决议认为，该论文是一篇“资料翔实，论析精当，富有新意的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毕业后作者又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修改、整理和扩充，形成了这部二十万字规模的专著。

我认为这部书稿有以下几个值得注意的特点。

首先，作者极大地拓展了佛教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的研究领域，在研究的范围、方法与广度、深度等方面均有明显的发展与开拓。尤其是对前人谈佛教影响时涉及较少的作家和语焉不详的作家如鲁迅、周作人、瞿秋白、郁达夫等作家所受到的佛教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的影响，从本体论的角度作了详尽的发掘和出色的归纳分析，在较深的层次上把握住了现代作家与佛教的精神关联。

其次，视野开阔，论证严密，富有创造性和启发性。“五四”作家接受佛教影响的背景异常驳杂，他们往往是在广泛地涉猎、比较世界各大宗教后，有所偏重，同时他们对包括佛教在内的宗教文化的态度又受到当时活跃而又芜杂的各种西方近现代文化思潮的影响，因此，在把握“五四”作家与佛教文化的关系时，研究者不仅要揭示出他们亲近或疏远佛教的内在原因，还要弄清楚这种选择对他们的思想与创作的 actual 影响和意义究竟在哪里，这是本课题研究的一个重点，也是一个难点。对此，作者表现出了高度的理论自觉，并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她将“五四”作家与佛教文化关系的论述，放置在中西文化大撞击和现代社会急遽转型的大背景中去审视，不仅注意到“五四”作家之近佛不同于古典作家的时代特点，而且发掘出“五四”时代知识分子精神活动及传统文化崩溃所造成的信仰空白

这两种原因构成的佛教蔓延现象，从而指涉到相当的历史深度。

第三，论述的思路新，有创意。作者认真地阅读了佛学著作，对于佛教精义和现代西方哲学有自己的理解，因而避免了一般论文或泛发议论或就事论事的弊端，对 20 世纪 20 年代诸多作家作品作出了独到而富有创见的解释，例如关于鲁迅的《野草》，过去只论述其象征与梦境描写受到西方作家特别是波特莱尔、尼采、屠格涅夫的影响，而少有人指出其大量意象来自佛家文化，其述梦笔法亦显示出浓厚的佛家色彩，在这里，作者的阐释对《野草》研究显然是一个较大的推进。其他如对周作人的中庸观、瞿秋白的信仰心理、郁达夫的逃禅意向以及冯至诗歌与佛教文化的关系的分析等，都写出了新意，能给人以启发。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学术著作，本书文风朴实，文字清新活泼，深入浅出，文采斐然。当然，佛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是一个具有文化史、文学史意义的重大课题，值得探讨的问题还很多。作为迎飞的博士指导教师，在她第一部专著即将出版之际，我感到由衷的喜悦，并希望她在今后的教学与科研中，一如既往，再接再厉，潜心治学，争取作出更大的成绩。

叶子铭

2002 年 1 月

目 录

总 序	钱谷融 (1)
序	叶子铭 (1)
总 论 “五四”作家近佛的原因及主要特点	(1)
第一章 鲁迅：于无所有中得救	(58)
第一节 鲁迅、尼采与佛教	(58)
第二节 以一身来担人间苦	(81)
第三节 谈鬼物正像人间	(103)
第二章 周作人：半是释家半儒家	(120)
第一节 从种业论到闭户读书论	(120)
第二节 茹苦忍辱，斯乃得度	(137)
第三节 非正统的杂家	(156)
第三章 瞿秋白：为信仰而战的革命家	(173)

第一节 菩萨行的人生观·····	(173)
第二节 信仰与皈依·····	(177)
第三节 以“道”解“佛”·····	(186)
第四章 郁达夫：忏尽情禅空色相·····	(191)
第一节 地来上谷逃禅易，人近中年弃世难·····	(191)
第二节 参透色空真境界，抛置乾坤再出家·····	(208)
第三节 伤乱久嫌文字狱，偷安新学武陵渔·····	(225)
第五章 许地山：佛体道心写“传奇”·····	(241)
第一节 知命、安命与“顺着境遇做人”·····	(241)
第二节 母性崇拜与“参得文坛底上禅”·····	(249)
第六章 废名：遗世而独立，微笑以拈花·····	(256)
第一节 “死”是人生最好的装饰·····	(256)
第二节 镜里偷生，拈花微笑·····	(264)
第三节 人生是一个修行的途径·····	(284)
结束语·····	(299)
主要参考文献·····	(306)

总 论：

“五四”作家近佛的原因及主要特点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知识分子“半是儒家半释家”的现象并不罕见，其中尤其以“五四”前后即 20 世纪 20 年代(1917-1927)最为典型。举凡鲁迅、周作人、郭沫若、瞿秋白、郁达夫、俞平伯、朱自清、许地山、废名、柔石、庐隐、石评梅、冯至、陈翔鹤、王统照、潘漠华、徐志摩等都曾涉足佛经。佛教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以及苦行精神不仅影响了他们的人生理念、社会实践，而且对他们的文化心态、生活方式、审美追求以及生命意识都产生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可以说，佛教对中国现代作家的思想与创作的影响是一个普遍而又特殊的现象。过去由于诸多原因，佛教影响长期被视为负面的、消极的因素，不受重视，直到现在，这方面的研究仍比较薄弱，有待进一步的深入。

“五四”作家之近佛既有宗教与文学本身的内在原因，也有与之相关的更为复杂的社会、历史、政治、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原因，因此，对于这一现象的考察，不仅有着文学或宗教的意义，也有着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文化方面的价值内涵。同时，由于佛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自己特殊的价值取向和

审美情趣，迄今为止仍在国人的深层心理中起着巨大作用，因此，从佛教文化这个窗口，我们也可以对本世纪初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与传统文化的复杂而微妙的深层关联有一个更深入的认识。



现代作家亲近佛教首先是与家庭、环境、亲友的影响分不开的。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佛教仍然在中国不少地方盛行。由于父母及亲友的影响，不少作家从小就有机会接触到僧侣，了解和尚的生活及地位，并对中国的寺庙佛塔等有较多的感性认识。鲁迅不到一岁就被家人领到长庆寺去拜和尚为师，并得到法名叫做“长庚”。周作人一生下来就被“老和尚转世”的传说所包围，因此从小就对佛教有一种特殊的亲近感。郁达夫则因为从小就看见守寡数十年的老祖母念佛经，并经常随着她去朝山拜佛还愿，对佛教更是情有独钟，留学日本时他甚至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颇愿牺牲一生，为宗教立一线之功，……祖母未死前，弟决不出家也，恐伤老人心耳。”^①在回顾自己一生时，郭沫若不止一次地说母亲对他影响最大。郭沫若的母亲不仅能读弹词，说佛偈，而且虔诚地信奉佛教，受其影响，郭沫若从小就喜欢王维、孟浩然等通禅悟带哲理的唐宋绝句。母亲的言传身教培养了郭沫若对文学的爱好，也影响到他一生的行为方式和人生追求，“综计吾母一生，有释子之苦行，而非趋于寂灭，似墨家之兼爱，而非借以要名；备孔氏之庸言庸行庸德，又能舍旧而谋新。畴昔所以勉励不孝等者，要不离乎自它两利，

^① 郁达夫：《致陈碧岑》，《郁达夫文集》第九卷，花城出版社 1984 年，第 315-316 页。

与救济群生。盖吾母之人生观，一本儒家之仁义，而兼抱佛子大悲与菩提心也。”^①可以说，郭沫若崇释又崇孔的人生观最开始即从母亲处得来。许地山、徐志摩也因为诞生在虔诚信佛的家庭跟佛教结下了不浅的因缘。许地山的母亲是虔诚的佛教徒，父亲许南英自号留发头陀和毗舍耶客，还有一位信禅宗的舅舅，很早就教导他读过不少佛经，这对他以后创作影响是极其深远的。至于徐志摩，不仅家中设有经堂，祖母和母亲都茹素，父亲晚年也茹素，就连他家中的佣人也会口授心经。因为在周岁时，有一个名叫志恢的和尚在他的头上抚摸过，为了应志恢和尚“必成大器”的预言，1918年，赴美留学前夕，其父更其名为“志摩”。因此，虽然徐志摩痛恨迷信，一生也不信任任何宗教，但耳濡目染，佛教的“众生平等”“慈悲喜舍”等教义也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在他复杂的思想之树上，有些根须就植在佛教的土壤里，这是不奇怪的。此外，瞿秋白、废名、石评梅、李金发、庐隐、潘漠华等作家亲近佛教也都与家庭及亲友的影响分不开。

与此同时，地域环境也从外部熏染、培养了现代作家对佛教的感性认识。废名出生在禅宗圣地湖北黄梅，郭沫若的家乡就在举世闻名的乐山大佛的附近，瞿秋白读书时最喜欢去的常州天宁寺是江南有名的古刹，夏丏尊、朱自清、俞平伯、叶圣陶等共事的春晖中学坐落在号称“佛国”的杭州，许地山则在布满佛寺、佛塔，以佛教为国教的缅甸仰光度过自己的青年时期……这些经历对于现代作家近佛也有一定的影响。

不过，相对来讲，师友的影响也许更直接，更深远。留学

① 郭开文：《祭母文》，转引自《郭沫若研究资料》（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8月。

之初，鲁迅和当时大多数热血青年一样，醉心于科学与工业，以为国家振兴在此一举，是章太炎使他看到向宗教特别是佛教吸取精神力量是改造人们精神世界的一个重要途径，从而使他的思想从留学初期的宣传反帝爱国和科学的自然观范畴进入到更深刻、更复杂的哲学、社会、文化思想领域，并开始具有自己的个人特色。瞿秋白学佛也与表兄周均量的影响分不开，在表兄的辅导下，他不仅系统地钻研了《成唯识论》和《大智度论》，而且有“就菩萨行而为人间化的愿心”（《饿乡纪程》）。宗白华曾回忆自己在上海同济中学读书时，喜欢躺在床上瞑目静听一位信佛的同学朗诵《华严经》，“音调高朗清远有出世之概，我很感动。我欢喜躺在床上瞑目静听他歌唱的词句，《华严经》词句的优美，引起我读它的兴趣。而那庄严伟大的佛理境界投合我心里潜在的哲学的冥想。我对哲学的研究是从这里开始的”（《我和诗》）。徐志摩拜师于梁启超，在梁启超的带领下，他曾去听过佛学大师欧阳竟无的佛学讲座，虽然佛学的微言奥义他听得迷迷糊糊，但对乃师的佛学造诣他却佩服得毫不含糊，“什么艰深的学理他都有法子讲得你点头，他可以讲佛学连着三四个钟头叫全堂听讲人不倦！在欧阳竟无先生口里笔下我们摸不清路子的微言奥义，这里在梁先生的讲义里，我们至少可以一流顺水往下看”^①。至于弘一法师对杭州白马湖作家群的影响则更是无所不在，举凡夏丏尊、叶圣陶、朱自清、俞平伯、朱光潜、丰子恺都曾直接间接地感受到他的人格魅力，以至于朱光潜在《丰子恺先生的人品与画品》中说：“当时一般朋友中有一个不常现身而人人都感到他的影响的——弘一法师。”就连

① 徐志摩：《关于梁启超〈佛教教理概要〉的附志》，《徐志摩文集》第四卷，广西民族出版社1991年。

当时正在杭州一师读书的柔石亦曾在弘一法师的感染下特地去拍了一张穿僧衣的照片，当他从夏丏尊处得到一幅弘一法师的手简时，他的激动更是溢于言表，“余幼鄙，不知叔同先生之为人，然一睹其字，实憾师之不及者。共和七纪，余学武林师校，适先生弃世为僧，故又不及见其人得其片幅。后先生知交夏先生丏尊嘉余诚，以此作赠余，余乐而藏之。此非余之好奇，实余之癖性也”。^①可以说，弘一法师之出家对柔石之近佛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此外如以周作人为核心的钱玄同、刘半农、俞平伯、废名，以及浅草——沉钟社的冯至、陈翔鹤、林如稷等也都是 20 世纪 20 年代比较有影响的以近佛相尚的文人群体。

二

20 世纪 20 年代作家之所以普遍地近佛或对佛教表示好感，与佛教自身的精神魅力密切相关。首先，佛教人生皆苦、世事无常的苦空观颇能传达现代中国特有的悲观情绪。从民国元年到五四运动之后的数年内是二十世纪中国苦难最为深重的一段时期，军阀的混战、社会的动荡、道德的沦丧、精神的匮乏、经济的衰退，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恶化等都使得觉醒的一代青年苦闷不堪，正如鲁迅所说：“那时觉醒起来的智识青年的心情，是大抵热烈，然而悲凉的。即使寻到一点光明，‘径一周三’，却更分明的看见了周围的无涯际的黑暗。”（《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因此，不仅辛亥革命失败以后，一大批知识分子借佛学来稳定情绪，平衡心灵，一时普遍流行读佛之风，“五

① 转引自盛钟健：《佛学思想对柔石的影响》，《西湖》1981 年第 2 期。

四”落潮后，亦有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到佛学中寻求精神慰藉。不仅王统照诉说：“苦痛象一把铁钎，把心灵钎起来，对于未来也不存什么希望，屏绝一切，与朋友断绝通问……弃绝世间的心思日夜地胸中起伏着”^①；石评梅悲叹自己六载京华，梦醒后只添得了无限惆怅，因此“常想到海角天涯，寻访古刹松林，清泉幽岩，和老渔父谈谈心”（《花神殿之一夜》）；郁达夫也“真想出家遁世，去做一个完全无系累，无责任的流人”（《穷冬日记》）。至于鲁迅，在辛亥革命失败后任职于教育部期间，即开始猛读佛经，他不仅大量购置，多方借阅抄录，而且与北京佛教协会的梅光羲和佛教徒许季上等来往密切，并与佛教经籍刊刻流布单位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以至于他的学生宋紫佩说鲁迅等人“现皆志于佛”。鲁迅的态度是有代表性的，陈独秀、瞿秋白、周作人、夏丏尊等“五四”学人大量接触佛学也多开始于辛亥革命失败以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使他们逐渐从苦闷、寂寞中走出，但普遍存在于社会中的封建性黑暗却使他们难以乐观。随着“五四”的落潮，新文化阵营的分化，他们再次深刻地体验到幻灭的悲凉，前期被压抑潜隐到内心深处的寂寞、苦闷情绪也逐渐回升，因此，鲁迅在这一时期提出的具有浓厚的佛家色彩的“人生苦”命题：“人生多苦辛”；“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国”；“人们的苦痛是不容易相通的”；“苦痛是总与人生连带的”^②等，引起了众多作家的共鸣。

① 王统照：《王统照短篇小说集·序》，《王统照文集》第二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

② 参见鲁迅：《坟·写在〈坟〉后面》，《华盖集·导师》，《华盖集续编·“死地”》，《两地书·二》，见《鲁迅全集》第1卷，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下同。

另一方面，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使得封建大家庭解体，在走向败落的过程中，现代作家饱受人生困顿、世态炎凉的打击。鲁迅愤慨地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毁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从养尊处优的少爷到一无所有的寄食者，瞿秋白亲眼目睹了封建大家庭中的人“面面相觑地戴着礼教的假面具，背地里嫉恨怨悻诅咒毒害，无所不至”（《饿乡纪程》）的残酷事实，悲愤地写下了“亲到贫时不算亲，蓝衫添得泪痕新，饥寒此日无人问，落到灵前爱子身”的辛酸诗句。母亲死后，在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大家族里讨生活的冯至，感觉自己除了抱着惟一的沉默，向那不知何时才能终了的人间地狱走去，对这苦难的人间再也不敢有什么奢求，他辛酸地写道：“我们的感觉是掘宝者的锄铲，但是我们在人间所掘挖出来的，只是一条条的毒蛇蜥蜴，它们围着我们，缠着我们，新陈代谢，直到我们的死亡。”（《乌鸦——寄M弟》）打开现代文学作品，这种诅咒人间的冷酷与虚伪的文字随处可见，正是它使得现代作家对“世事无常”、“诸受皆苦”的佛学教义产生了感同身受的亲切感，以至于鲁迅深有感触地说：“释迦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启示了，真是大哲”。^①瞿秋白也说：“老庄是哲学，佛经里也有哲学，应该研究”。^②正因此，朱自清不仅在中学时最爱读的书是《佛学易解》，到北京上了大学哲学系后还是喜欢找佛学书看，诸如《因明入正理论疏》、《百法明门论疏》、《翻译名义集》等都是他那时爱看的

①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第44页。

② 周君适：《瞿秋白同志在黄陂》，《山花》1981年2月号。